



二十世纪
中国文化
研究文库

LI SHI YU YI ZHI

〔美〕魏斐德 著

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郑大华等 译

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变革，风起云涌，百年苍桑。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也经历了空前的嬗变，其间功过得失，值得展望 21 世纪明天的人们作更深入的认

本文库旨在积累批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化而卓然成一家的学术成果，以期 20 世纪中国文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价值作出总体性的探索与把握。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2-5141 0

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美] 魏斐德 著
郑大华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
哲学透视

〔美〕 魏斐德 著
郑大华 等译

责任编辑 奚晓青
装帧设计 张世申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格：850×1168毫米 1/32
·12 印张 256千字
版次：1994年4月1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0.80元

ISBN 7-221-03010-3/G·1567

《20世纪中国文化 研究文库》总序

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先是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继而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逐步走向世界的时期。它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在这样特定的背景下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化，便不能不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它以社会变革为自己的神圣主题，以文化转型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一方面凝聚着数代中国人为寻求中国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所作的孜孜探索，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西方文化历史性碰撞交汇的壮观图景。现在，20世纪即将走完自己的历史行程，对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进行研究总结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文库》的缘由。

《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文库》主要立足于人文学科领域，力图以宏观的视野，开阔的胸怀，理论的锐气，对20世纪中国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审视和探讨，尤

2617/04

其是对 20 世纪中国重要的文化思潮、文化现象、文化事件和文化名人进行深入的剖析与评判，并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展望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因此，本文库既在于对 20 世纪中国文化作实事求是的研讨，也在于为现实的改革实践和未来的文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库为学术性丛书，要求学风严谨，不随波逐流，不哗众取宠，不追求轰动效应，但求能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在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概括、文献丰富、文笔流畅的统一。在以著述为主的同时，兼及少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作。

愿这套文库能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和欢迎。

《20 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文库》编委会

1991 年 11 月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综论 | 1 |
| 一 革命的缔造者 | 3 |
| 二 红太阳 | 18 |
| 三 专政者 | 27 |
| 四 伟大的立法者 | 46 |
| 五 神话君主 | 64 |
| 六 理想的探索者 | 81 |
| 第二章 意识的转变 | 101 |
| 七 各种关系和影响 | 103 |
| 八 19世纪公羊学的复兴 | 107 |
| 九 调和的乌托邦 | 120 |
| 十 破与立 | 142 |
| 第三章 自由 | 157 |
| 十一 新青年 | 159 |
| 十二 理性主义 | 171 |
| 十三 唯心主义 | 190 |

| | |
|------------------|------------|
| 第四章 必然 | 209 |
| 十四 社会主义 | 211 |
| 十五 马克思主义 | 231 |
| 十六 王阳明：实践传统的先例 | 251 |
| 十七 王阳明：存在的契约 | 267 |
| 第五章 历史与意志 | 281 |
| 十八 新黑格尔主义 | 283 |
| 十九 矛盾 | 306 |
| 二十 揽月 | 314 |
| 附录 | 322 |
| 一 注释缩写 | 322 |
| 二 注释 | 324 |
| 译后记 | 374 |

第一章

综 论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东方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高位不是很快就获得的。1935年1月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使他成了党的领导人，但是直至1942年，在经过7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政治变动后，他和他的思想才在党内取得了支配地位。^①然而，他那理想化的经历所投射出的形象更惹人注目：作为一位有预见的革命家，他坚信只有武装斗争一条道路能导致革命事业的胜利，这使他在与力量相差悬殊的对手的竞争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人们称颂列宁，是因为他能按情况需要作出让步和调整个人的信仰。毛泽东也因为他坚定的自我信念及其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动力的深刻理解而得到了赞扬。

使毛泽东成为这样一位坚定、诚笃的特殊人物的一个原因是他早期受到的实用主义影响。他所主张的策略——1927年对农民激进主义的依靠，1933年的游击战争和1935年率先北上抗日的决定——常常和教条主义及共产国际的指示相抵触。毛泽东从来不孤立地坚持这些教条的东西，也不独立地发展它们。但是，他的确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更早地意识到如果红军像作战那样致力于发动农民，革命就会在农村开展

起来。

于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变成了毛泽东与各种倾向作斗争的历史——这些倾向来自党内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因为革命军队当时处于延安黄土山丘这样的偏僻之地。毛泽东对早期革命胜利所作的预测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他似乎是独自发动了革命，以致共产党的胜利成了他个人的胜利，20世纪中国的历史成了他个人的经历。毛泽东甚至比列宁更能体现——拥有——革命。革命的命运是他的安危，革命的成功是他的自我实现。当我们跌到自己所设计的角色中去时，我们便都成了自己的虚构物。毛泽东与大多数人的区别就在于他能明鉴历史本身所赋予的形象和历程，他并不只是因为自己的失败次数而对人民的习惯势力感到担忧，以及为革命胜利后的衰退而感到烦恼。相反，他相信除非历史许可，除非革命本身使然，否则，他就不可能使自己的革命事业流芳百世。

毛泽东在内战快结束时，担心革命会遭到失败。1949年胜利前夕，他已经觉察到了这种可能性：权力正在腐蚀他的同事们的革命纯洁性。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②

胜利把一代革命者带离中国农村而进入到资产阶级的大城市。战士变成了官僚，干部脱离了群众。“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喜欢计

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③即使——毛泽东坚持——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胜利也会麻痹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随着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的胜利和武装敌人的失败，斗争已经彻底结束。“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④

朝鲜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动员运动在群众和党内产生出巨大的热情，暂时地减轻了毛泽东对革命会出现衰退的担忧。但是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及其同事们作出了强烈的反应，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这可能是毛泽东亲自动笔写的。社论警告：“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⑤后来，毛泽东曾一再强调难以取得彻底的胜利及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1957年1月，他宣布中国还存在着被打倒的地主和买办阶级的残余，“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⑥

后来，毛主义者之间也发生了争执，主席用这些批评来反对副主席刘少奇，因为刘少奇自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提出了没有必要再以搞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的理论。^⑦但那只是一种事后的思考，引起毛泽东担忧的主要原因是发生在东欧的骚动。如果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如此容易受到威胁而发生动摇，那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又会如何呢？

毛泽东所特有的王朝兴衰的观念，更加剧了他对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例如，在内战的最后几年里，他对糖衣炮弹的论述，就是因为他审慎地联想起尽人皆知的“刘宗敏现象”的教训。刘宗敏是一位臭名昭著的贪婪将军，1644年他参加了李自成（1605？—1645）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打败北京城外的明朝军队后，起义军在刘宗敏将军的指挥下进入了北京，但抢劫和拷打居民却损害了老百姓对新王朝的支持。满族军队很快把李自成逼出京城，建立起了清王朝。诗人郭沫若似乎很清楚出现在农民起义军和红军中的这种类似情况，并于1944年发表了一篇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如果共产党人像李自成一样，进入都城仅仅是为了取代富人的统治，那他们所建立的“王朝”也只能是短命的。毛泽东很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近日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戒鉴，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⑧

同样地，毛泽东——他童年时代崇拜的英雄人物都是皇帝，像汉武帝（前140—87年在位）^⑨——不能不把自己的胜利和一位开国统治者的成就联系在一起。像这样一个君主，他也肯定意识到保持胜利的难度，即使毛泽东本人没有联想，党内的其他人也会这样为他着想，把他比作秦始皇（前221—210年在位）。秦王朝统治的崩溃是由于它对人民沉重的勒索。^⑩毛泽东从他所受的传统教育（他受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影响）和对儿时读过的古典小说的记忆，引起了他与所有中国人都很清楚的这种王朝更替循环的警觉。^⑪《三国演义》开头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⑫这不是说毛泽东害怕他的共和国会出现同样的衰退，但中国统治王朝的嬗变更替及各朝编史工作，使人想到所有的统治政权在开国初都因缔造者的热情而充满活力，但当后继者们滥用先辈的

政治遗产时，政权就只有衰败下去。

当苏联表现出要背叛革命，允许按照利别尔曼（Yevsey Liberman）臭名昭著的市场机制去管理工厂，允许看好莱坞电影（美国的精神鸦片），或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垄断大学，把考试成绩看做深造的唯一条件时，这种历史倾向似乎注定有较多的普遍性。^⑬毛指出：在苏联，已经组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整个国家很快地就改变了颜色，在这车轮倒转的时刻，我们必须保持警惕。^⑭

为确保党避免出现修正主义，1962年1月，毛泽东告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党必须更加全心全意地走群众路线，必须通过鼓励和听取批评来发展民主。总而言之，让别人说话，并不会使天塌下来，也不会亡国。如果我们不允许别人讲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自己必然会失败。^⑮大约在同时，毛泽东已开始强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⑯

到1963年4月，毛泽东终于觉察到，如果忘记正在继续的阶级斗争，一次反革命复辟就会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法西斯政党。^⑰实际上，共产党本身就可能存在着反革命复辟的危险。

18个月后，毛泽东给党内的这种倾向取了个名称——“走资本主义道路”，也给像刘少奇这样的干部取了一个称号：“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⑩ 1965年8月，主席问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⑪ 最后，在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实际上已在一份通告中声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⑫

过去，毛泽东曾多次决定，共产党员需要接受再教育。^{*} 但是整风运动基本上是改进党的组织，而不是从党外发动一场思想革命。现在，由于受反革命即将来临的判断的驱使，毛泽东对党不满意，就好像它是一个敌对的政治组织。毛泽东曾声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⑬ 所以，他要求助于社会，希望发动舆论来支持他，而不是发动一场斯大林式的政治清洗运动。这种吸引舆论的愿望是由三个影响造成的：他那传统的中国学问强调从道德上影响人民的必要性，以便“革新”他们；他所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他对意识观念异常敏感；他在内战年月里的经历教给他发动群众的重要性。

后一个影响无疑是最有决定性的，但是，第一个影响——他的传统学问——却体现了毛泽东道德拯救信念的传统来源，以及为他在人民共和国施行公众道德灌输提供了制度上的先例。与此同时，如果对清朝的“乡约”制度和毛泽东的“邻里公约”进行比较，两种制度就会在相似的表面下，显示出巨大的差异。

“新民”的思想也就是要用道德感化来塑造“新民”。至少，这对创办“新民学会”有重大意义，该学会是毛泽东1917年在

* 毛泽东通过教育方式解决党内争执的方法可以追溯到1929年的古田会议：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消灭等级，从而完善了这一方法。参看马克·谢尔顿（Mark Selden）：《中国革命的延安方式》（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pp.188—200——原注

长沙读书时发起创立的。“新民”这个专用名词是受早期改良刊物《新民丛报》的直接启示而提出的，这份杂志由毛泽东早期所崇拜的英雄梁启超(1873—1929年)主编。但这个名词则起源于远古时期，《大学》——后来所有中国学生都要背诵的《四书》中的一本——的第一页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②对大多数儒家学者来说，这段话强调了士大夫通过模范道德行为来感化被动群众的职责，但也创造出的一套采用积极灌输方式来革新人民的传统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明朝(1368—1644年)的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年)发明的“乡约”制度。1518年，王阳明受命在他镇压叛乱的赣南地区制定“乡约”来吸引群众加入民众团体，以平定叛乱。“乡约”制度本身反映出这样一种设想：邪恶是由堕落的民俗所引起的一种反社会的行为。虽说官吏们承担着维持百姓守“礼”的根本职责，但他们除非让地方社会成员也一同来维持礼，否则，他们就根本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是因为还很少有人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他们自己。王阳明实际上就是试图建立起一系列增强社会道德的组织，他设想让一个乡约地区的居民选出首领(约长)以记录他们一天的活动；个人捐款用以支付每月聚会的开支；每一次聚会上，聚众都要随着鸣鼓仪式大声宣誓：

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祇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③

然后对每个乡约成员在上月的表现进行一丝不苟的讨论，好的行为会得到热情的赞扬，不好的行为要受到批评，对歹徒则要令其跪而悔过。“乡约”制度一再重申集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帮助百姓改过自新，一旦发现了某人的恶行，就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而不是把他交给司法

* 最初的“亲民”(to be intimate with the people)由宋代的新儒家变成了“新民”(to renovate the people)。——原注

的衙门。

若有难改之恶，且勿纠，使无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恶矣。约长副等，须先期限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②

“乡约”制度废于明末，但经17世纪混乱后，又得到了部分恢复，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王朝的统治。清朝（1644—1911年）第一位皇帝顺治（1644—1661年）颁布“六谕”^{*}以开导人民，从而恢复了乡约制度。^③为解释这些条文，还从各团体里的生员（通过了最低一级考试的人）和有德行的长者中挑选一位约长，约长和他的助手在一月中要两次召集居民宣读“六谕”，要求他们孝训父母，尊敬长辈，和顺乡里，教训子孙，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生计平静工作，而不去犯罪。

随着时世的推移，乡约制度更加完备，到1729年，已经要任命三名以上的助手来帮助约长解释皇帝的圣谕。每个地方都要指定一专用场所作讲约所，此外，原来的“六谕”被扩充。早在1670年，康熙帝已将它增为十六条圣谕，把情感和基本原理方面的东西变成了条文。圣谕不是告诉中国老百姓“事父母则当孝养”，而是命令他们要“敦孝弟以重人伦”。每一条都对社会崇敬的道德目标作出了解释，“和乡党以息争讼”，“明礼让以厚风俗”，“隆学校以端士习”，如此等等。尤其重要的是，十六圣谕着重强调人们要满足于享有一个合适而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尚节俭以惜财用”，“务本业以定民志”。帝国的臣民因此分为两类：一类是靠得住的人，另一类是靠不住的人。皇帝正是靠前者来解释法律条文，以警告那些愚顽好事之徒，并充当上层社会与社会底层之间的调停人。

^{*} 最早的六谕或训诫是明朝开国皇帝在1397年颁布的。参看《皇明太祖实录》，（台北，照相石板印刷，1966年），p.3677。——原注